

周秦汉唐文化工程·学术研究文库

唐代

郭绍林/著

TANGDAI SHIDAFU YU FOJIAO

士大夫与佛教 (增补本)



 三秦出版社

中国佛教史论丛·第11卷

唐代

卷之十一

士大夫与佛教



上海古籍出版社



唐代

士大夫与佛教 (增补本)

郭绍林 / 著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唐代士大夫与佛教:增补本 / 郭绍林著.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6. 12
(周秦汉唐文化工程·学术研究文库/魏全瑞主编)
ISBN 7 - 80736 - 065 - 8

I. 唐... II. 郭... III. 佛教史—研究—中国—唐代
IV. B94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1028 号

周秦汉唐文化工程·学术研究文库
唐代士大夫与佛教(增补本)

郭绍林 著

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电 话 (029)87205106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陕西丰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2
字 数 306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标准书号 ISBN 7 - 80736 - 065 - 8/K · 46
定 价 23.00 元



作者简介

郭绍林，1946年1月24日出生于河南省洛阳市金溪乡（今孟津县麻屯镇）。本科和研究生分别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1970）和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唐史专业（1983），历史学硕士，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出版专著《唐代士大夫与佛教》、《隋唐军事》、论文集《隋唐历史文化》，合著《谋士传》、《中国古代治安制度史》、《中国古代编辑家评传》、《中国牡丹大观》。

内容简介

这本《唐代士大夫与佛教》，是迄今为止海内外研究该课题的惟一专著，从政治史、社会史、宗教史、思想史、文学史、美学史、教育史等方面，全方位、多角度地研究唐代士大夫与佛教的种种关系、士大夫与佛教的相互影响、士大夫奉佛的方式和原因等问题，所得结论多为人所未言，纠正了一些习焉不察的流行说法。本书大陆简体字初版本，曾由台湾购买繁体字本版权出版，被广泛引用。

这个新版本是修订增补本。附录《佛教文化》讲稿，概述了佛教理论、宗派、民俗信仰、名胜古迹、佛教制度等方面的基本情况。

缘 起

中国佛教发展到了唐代，遇到了时代的契机，异军突起，蔚为大观。佛教风靡于全社会，渗透到各个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当时佛教、道教、儒教三家鼎立的情况下，从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影响方面来说，佛教虽然不曾取得国教的资格，但在实际上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样的形势下，唐代的士大夫阶层便不可避免地与佛教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构成了唐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因而也成为历史研究的重大课题。本书所做的初步探讨，便是以唐代士大夫与佛教的联系和相互间的影响作为考察对象的。

为了研究的方便，有必要对唐代士大夫和佛教这两个概念做出基本的限定。唐代的士大夫是个广泛的阶层，在文献上有搢绅、朝士、士人、文士、士子、儒者、衣冠、大夫等等不同的称谓。此外，士大夫一词有时专指某一类人。北宋王谠《唐语林》卷2说：“代有《山东士大夫类例》，其非士族及假冒者不见录。”这里的士大夫，仅仅指地主阶级中的士族地主。《资治通鉴》卷197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条记载：唐太宗征辽，说：“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余力以取之。”这里的士大夫，兼指文臣和武臣。把武人称为士大夫，古已有之。西汉司马迁《史记》卷109《李将军列传》说：“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南朝刘宋范曄《后汉书》卷19《耿弇传》记载：刘秀建东汉前夕，注意拉拢王莽时期的文武人员。破王郎以后，刘秀宣称：“当与渔阳、上谷士大夫共此大功。”在战斗中立功的原王莽下属，被刘秀封为大将军、偏将军。唐制出将入相，文武不分，很多武人都是文士出身。本书所考察的士大夫，是指以修习儒家著作而安身立命的文人和文人出身的武官，他们的身份不再分什么士族、庶族、簪组、布衣，纯粹武

人则置而不论。而唐代的佛教,既是宗教,又是社会组织、社会势力和意识形态。本书在叙述和分析的时候,有时指佛教整体,有时则指一个或某几个方面。

笔者自知能薄才寡、绌短汲深,本书中童牛角马和纰缪疏漏的地方一定不少,期待方家通人不吝赐教,严正批评。

目 录

缘 起

第一章 士大夫与佛教的不解之缘	(1)
第一节 士大夫的崇佛风气	(1)
第二节 儒释交游	(8)
一、唐代儒释交游是前代儒释交游的继续	(8)
二、唐代僧人异于前代僧人的时代特点	(9)
三、士大夫对僧人的选择	(12)
四、僧人对士大夫的选择	(17)
五、以李白、韩愈为代表的儒释交游的两种特殊类型	(19)
第三节 儒释间的提携磋磨	(28)
第四节 在家出家	(34)
一、在家出家是士大夫变通折衷的修持方法	(34)
二、在家出家法赖以提出的社会根源	(37)
三、在家出家法何以能够成立	(43)
(一)士大夫崇佛的主要倾向是求得思想的解脱	(43)
(二)崇佛士大夫思想主导成分仍是儒家	(49)
(三)士大夫身份的保持	(51)
第五节 史的鸟瞰	(52)
一、安史之乱前后鸟瞰	(52)
(一)安史乱前鸟瞰	(52)
(二)安史乱后鸟瞰	(58)
二、空间分布	(63)
三、宗派选择	(65)
四、经典流布	(75)

第二章 士大夫与佛教的关系(上)	(85)
第一节 士大夫关于佛教的文字活动	(85)
一、应制类	(85)
二、游览类	(87)
三、译经类	(89)
四、赠答类	(90)
五、碑铭类	(91)
六、记赞表书类	(93)
七、佛理类	(95)
八、注疏类	(97)
九、反佛类	(97)
十、其他类	(98)
第二节 士大夫日常用语中的佛教渗透	(98)
第三节 士大夫家容僧尼	(102)
第四节 僧社	(107)
第五节 士大夫的应举、出仕与佛教	(113)
一、雁塔题名	(113)
二、寺院读书	(117)
三、士大夫落第与佛教	(119)
四、僧人干预科举	(120)
第六节 士大夫的隐居与佛教	(122)
第七节 士大夫的避难与佛教	(127)
第八节 士大夫和蕃僧的关系	(130)
第九节 士大夫关于佛教的经济利害关系	(134)
第三章 士大夫与佛教的关系(下)	(139)
第一节 士大夫的反佛活动	(139)
一、士大夫对佛教的怀疑嘲笑态度	(139)

二、士大夫对佛教和政府大做佛事的批评言论	(141)
(一)经济方面	(142)
(二)政治方面	(144)
(三)文化方面	(145)
(四)历史经验	(146)
(五)处理方略	(147)
三、士大夫对佛教的打击行为	(148)
第二节 评论	(150)
一、论士大夫反佛	(150)
二、论韩愈兼及姚崇、李德裕反佛	(159)
第四章 佛教对士大夫的影响	(187)
第一节 佛教对士大夫思想方面的影响	(187)
一、思想开发	(187)
二、柳宗元、刘禹锡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192)
三、说理散文	(201)
四、李翱的《复性书》	(205)
第二节 佛教对士大夫处世态度的影响	(211)
一、消极态度	(211)
二、积极态度	(221)
第三节 佛教对士大夫诗歌活动的影响	(226)
一、佛教与诗歌活动之间联系的沟通	(226)
二、佛教对士大夫诗歌活动的影响	(229)
(一)佛教对诗歌活动的广泛影响	(229)
(二)佛教对诗歌创作的作用	(230)
(三)宗教类诗	(235)
(四)非宗教类诗	(239)

第五章	士大夫对佛教的影响	(244)
第一节	宣传	(244)
第二节	捍卫	(247)
第三节	改造	(253)
第六章	士大夫奉佛的原因	(260)
第一节	佛教环境对士大夫的熏染	(260)
第二节	佛儒文化的合流对士大夫的吸引	(268)
第三节	多才多艺的僧人的媒介作用	(276)
第四节	佛教的善巧化诱	(278)
第五节	士大夫的主观需要	(289)
附录	佛教文化	(292)
后记		(374)

第一章 士大夫与佛教的不解之缘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经过几百年的咀嚼消化,便完全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它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渗透,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唐代是佛教的鼎盛期,宗派林立,僧侣众多,佛典充斥于世,佛刹精舍比比皆是。士大夫和其他居民一样,不得不在自己的生活领域中,和佛教打交道。

第一节 士大夫的崇佛风气

早在唐朝初建时,太史令傅奕在给唐高祖的一份奏疏中就曾指出:“搢绅门里,翻受秃丁邪戒;儒士学中,倒说妖胡浪语。”〔1〕接着,唐太宗又指出:佛教传入中国,“泊于近世,崇信滋深”,以至于“好异者望真谛而争归,始波涌于闾里,终风靡于朝廷”。〔2〕到了唐后期,唐文宗又指出:“黎庶信苦空之说,衣冠敬方便之门。”〔3〕这些不同时期的相同结论,可以说是官方对于有唐一代士大夫普遍崇佛状况的通报。

为了解士大夫崇佛的普遍性,就需要列举一些具体的事例。

傅奕的同时代人萧瑀,就是一个代表。他“专心释氏,尝修梵行,每见沙门大德,尝与之论难及苦空,思之所涉,必谐微旨”。〔4〕唐高祖组织群臣讨论傅奕关于废除佛教的奏疏,萧瑀

〔1〕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11,傅奕《上废省佛僧表》。

〔2〕唐释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

〔3〕《唐大诏令集》卷113《条流僧尼敕》。

〔4〕《册府元龟》卷821《总录部·崇释教》。

激烈反对,和傅奕直接交锋,说:“佛,圣人也。奕为此议,非圣人者无法,请置严刑。”傅奕反驳道:“萧瑀非出于空桑,乃遵无父之教。臣闻不孝者无亲,其瑀之谓矣!”萧瑀不能回答,只是合掌咒骂道:“地狱所设,正为是人。”〔1〕唐太宗曾经赐给萧瑀绣佛像一躯,在佛像旁绣着萧瑀供养的姿势;还赐给他一部南北朝时期王褒书写的《大品般若经》,以及充当讲诵服装的袈裟。萧瑀的家族中有将近二十人出家。据唐初僧人道宣《续高僧传》卷28记载,男性僧人有慧铨、智证。据《金石萃编》卷54《济度寺尼萧法愿法师墓志》和《关中石刻文字新编》卷3《大唐济度寺故比丘尼法乐法师墓志》、《大唐济度寺故比丘尼法灯法师墓志》,女性僧人有法乐、法愿、法灯、惠源等。萧瑀为《法华经》(《妙法莲华经》)撰疏,采集十多家注解,间有自己的心得体会,经常邀集京师名僧加以讨论。他的哥哥太府卿萧璟,一生诵读《法华经》一万多遍,雇人抄写一千部,每次朝参,要让侍从人员在前面手执经卷,公事之隙,抓紧诵读。家族中无论尊卑贵贱,对《法华经》都能成诵。道宣对这个崇佛世家大加赞赏,说:“萧氏一门,可为天下楷模矣。”〔2〕

王维字摩诘,他的名字就是由于崇佛而取典于佛教维摩诘居士的。他在《叹白发》诗中说:“人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3〕他平常断荤血,吃素食,不穿华美的衣服。在京师,他每天饭名僧十数,以玄谈为乐事。斋中除了茶铛、药臼、经案、绳床,没有别的摆设。退朝之后,他便焚香独坐,专事坐禅诵经。妻子去世,不再娶,30年独居一室。临终之际,他给平生亲故写信,“多敦厉朋友奉佛修心之旨”。〔4〕

〔1〕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79《傅奕传》。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

〔2〕 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28《慧铨传》。

〔3〕 《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排印本)卷128。

〔4〕 《旧唐书》卷190《王维传》。

裴休出生在一个世代奉佛的家庭。他在公事之余,常常游践山林,与僧人讲求佛理。他在锺陵当观察使时,将希运禅师由洪州高安县黄檗山迎至州治的龙兴寺,早晚问道。后来到了宛陵,再迎希运至所部,旦夕受法。他将自己和希运的问答记录下来,成为《筠州黄檗山断际禅师传心法要》一文。他以华严宗人宗密为师,还为宗密所写佛教文字撰序。他中年后不食荤血,斋戒摒弃嗜欲,“香炉贝典,不离斋中,咏叹赞呗,以为法乐”。〔1〕他还按照印度原始佛教的做法,经常身披毳衲,到歌妓院持钵乞食,所谓接受堕落女人的供养。他还宣称:“不为俗情所染,可以说法为人”;“愿世世为国王,弘护佛法”。〔2〕

士大夫对僧人的尊崇和礼遇,不仅包括当时在世的,也包括已经去世的。武则天时,禅宗创始人慧能在韶州传弘佛教。后来,宋之问贬官衡阳,特意南下韶州参谒慧能,还写了一首长诗,说:“洗虑冥空寂,焚香结精誓。愿以有漏躯,聿(一作辛)熏无生慧。物用益(一作一)冲旷,心源日闲细。”〔3〕慧能去世后,武平一通过其门人怀让铸巨钟,武平一自撰铭赞,宋之问书写。唐玄宗时,宋璟节度广州,专诚去礼谒慧能塔,向其弟子令韬问无生法忍意。宋璟听令韬讲毕,非常高兴,向塔乞示征祥,不一会儿便出现奇瑞。唐宪宗时,马总当岭南观察使,因慧能去世百年尚无称号,就上疏朝廷,请求赐号;于是“诏谥大鉴禅师,塔曰灵照之塔”。〔4〕

裴宽曾上表请求出家为僧,没能获得批准。他和僧人往来,焚香礼忏,老而弥笃。他在洛阳当河南尹时,禅宗北宗普寂禅师

〔1〕《册府元龟》卷927《总录部·佞佛》。

〔2〕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卷6。

〔3〕《全唐诗》卷51,宋之问《自衡阳至韶州谒能禅师》。

〔4〕《柳宗元集》卷6《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5月版。

去世，他偕同妻孥，身着孝服，设次哭临，妻孥都送丧至嵩山。严挺之和僧惠义十分友善。惠义去世，他穿孝服送丧至龛所。他自己病重时，自撰墓志说：“十一月，葬于大照（普寂谥号）和尚塔次西原，礼也。”〔1〕

士大夫设斋念经，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这一方面是由于祈求冥福，一方面是由于日常生活中这种不成文规定已成为社会默认的程序。李林甫每逢生日，就请僧人来家设斋赞佛。此外，还有写、刻佛经的。扬州司户曹司马乔卿，母亲去世，毁瘠骨立，“刺血写《金刚般若经》二卷”。〔2〕张说《般若心经赞》说：“秘书少监、驸马都尉茱阳郑万钧，深艺之士也，学有传癖，书成草圣，乃挥洒手翰，镌刻《心经》。……国老张说闻而嘉焉，赞扬佛事，题之乐石。”〔3〕

士大夫不仅自己崇奉佛教，还进行义务的传教活动。朝散大夫、郟城令牛腾自称布衣公子，到西南蛮族聚居的牂牁做官。他“素秉诚信，笃敬佛道，虽已婚宦，如戒僧焉。口不妄谈，目不妄视，言无伪，行无颇，以是夷獠渐渍其化，遂大布释教于牂牁中”。〔4〕

士大夫的崇佛，还表现在研读佛典、探讨佛理方面。有不少士大夫是仅次于佛门高僧的佛教典籍的研究者。萧颖士“儒释道三教，无不该通”。〔5〕李华、段成式等人也是如此。有的士大夫，佛学造诣远远超过高僧。他们不但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以求，把佛学理论理解得十分透彻，而且还比较内学外学的同异，找出其渊源和交叉渗透的成分。柳宗元说：“吾自幼好（一作学）

〔1〕《旧唐书》卷99《严挺之传》。

〔2〕《太平广记》卷103《司马乔卿》条引《法苑珠林》。

〔3〕唐张说：《张燕公集》卷8。

〔4〕《太平广记》卷112《牛腾》条引《纪闻》。

〔5〕北宋钱易：《南部新书》庚部。

佛,求其道积三十年。”〔1〕他的《晨诣超师院读禅(一作莲)经》一诗,叙述了自己的读经活动。诗云:“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遗(一作遣)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馀,青松如膏沐。澹然离言说(一作语),悟悦心自足。”〔2〕可以看得出,他把研读佛典安排在一天中最宝贵的时刻。对于佛理有了深刻的理解之后,他还批评一些他认为不符合佛教原意的理解:“而今之言禅者,有流荡舛误,迭相师用,妄取空语,而脱略方便,颠倒真实,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又有能言体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须离也。离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3〕刘禹锡说:自己做官20年,百虑而无一得,在懂得了世间所谓道无非畏途之后,深感“唯出世间法可尽心尔”,因而案席上放的多是佛教典籍——“旁行四句之书”,自己达到了“事佛而佞”〔4〕的地步。

白居易早年即“栖心释梵”〔5〕,“通学小中大乘法”。〔6〕据他的《与济法师书》〔7〕、《华严经社石记》〔8〕,以及《钱虢州以三堂绝句见寄,因以本韵和之》〔9〕、《病中看经赠诸道侣》〔10〕和《开龙门

〔1〕《柳宗元集》卷25《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北宋苏轼《苏东坡集》后集卷19《书柳子厚大鉴禅师碑后》说“柳子厚南迁,始究佛法”,是不符合史实的。

〔2〕《全唐诗》卷351。

〔3〕《柳宗元集》卷25《送琛上人南游序》。

〔4〕《刘禹锡集》卷29《送僧元嵩南游序》。《全唐诗》卷359作“东游”。

〔5〕《全唐诗》卷458,白居易《病中诗十五首·序》。

〔6〕《白居易集》卷70《醉吟先生传》。

〔7〕《白居易集》卷45。

〔8〕《白居易集》卷68。

〔9〕《全唐诗》卷441。

〔10〕《全唐诗》卷459。

八节石滩诗二首》〔1〕等诗自注，可知他读过的佛教典籍有《维摩经》、《首楞严三昧经》、《法华经戒》、《法王经》、《金刚三昧经》、《金刚经》、《华严经》、《法华经》、《涅槃经》等等。他在《苏州重玄寺法华院石壁经碑文》中，统计了八种通行佛经的字数，归纳了各自的主题思想，表现出自己对佛典的高度娴熟程度：

夫开示悟入诸佛知见，以了义度无边，以圆教垂无穷，莫尊于《妙法莲华经》，凡六万九千五百五言。证无生忍，造不二门，住不可思议解脱，莫极于《维摩经》，凡二万九千九十二言。摄四生九类，入无余涅槃，实无得度者，莫先于《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凡五千二百八十七言。坏罪集福，净一切恶道，莫急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凡三千二十言。应念顺愿，愿生极乐土，莫疾于《阿弥陀经》，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见观真相，莫出于《观音普贤菩萨法行经》，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论自性，认本觉，莫深于《实相法密经》，凡三千一百五言。空法尘，依佛智，莫过于《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种经，具十二部，合一十一万六千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要旨，万佛之秘藏，尽矣。〔2〕

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可以说找不到一个对佛教知识一无所知的士大夫。即使是对佛教持否定态度的人，他们对佛教理论也是有一定程度的理解的。南宋马永卿引友人王抃话说：“世人但知韩退之（韩愈）不好佛，反不知此老深明此意。观其《送高闲上人序》云：‘今闲师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胶，是其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泊与淡相遭，颓隳萎靡溃败，不可收拾。’观此言语，乃深得历代祖师向上休歇一路。其所见处，大胜裴休。且休尝为《圆觉经序》，考其造诣，不及退之远甚。唐

〔1〕《全唐诗》卷460。

〔2〕《白居易集》卷69。“开示悟入”原作“开士悟入”，据《法华经》卷1《方便品》校改，参见本书第六章第四节。